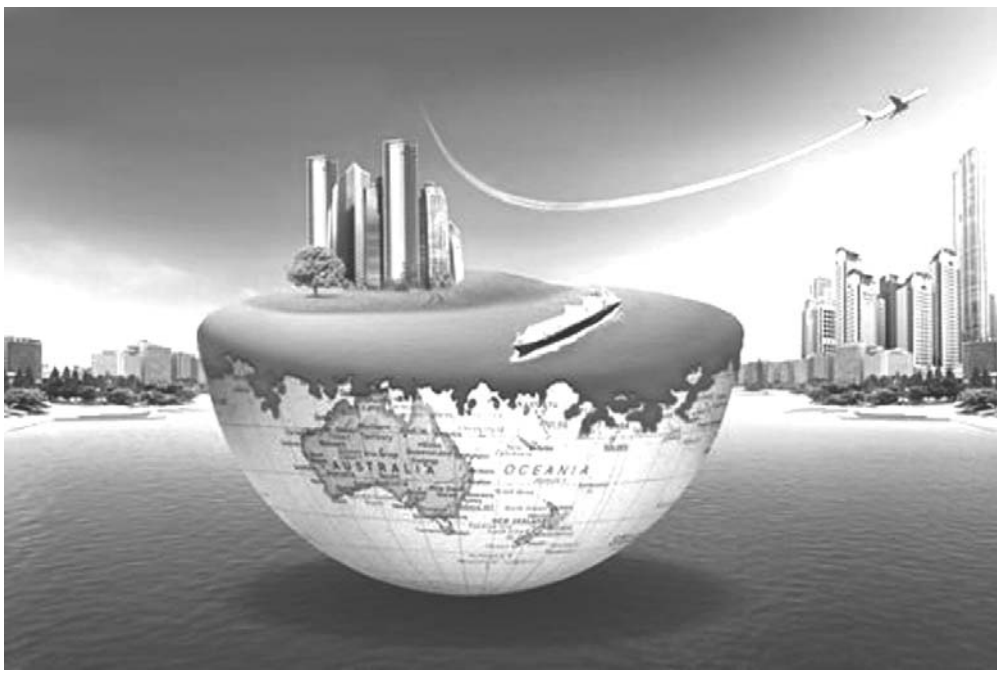


把城市看作一个“消费品”

□ 王宁



尽管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提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口号，并纷纷建立各种名目的科技产业园区，出台各种吸引高科技公司和人才的优惠政策，但各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并非全由产业政策的差异所造成。事实上，面对高新技术产业上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各地所出台的吸引高科技公司和人才的政策优惠出现了趋同现象。当然，除了产业政策，区位优势也可能是造成高科技产业差异的一个原因。但同处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和东莞，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产值上却呈现出巨大差异，这足以说明，仅仅用传统的政策优惠和区位优势，来解释人才和高科技产业的流动趋势，已难以令人信服。

在当代社会，居民作为消费者，不但重视对具体的物品和服务的消费，而且越来越把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性产品来消费；这种把地方作为一个整体性消费品来进行选择的消费偏好和价值观念，就是地方偏好(用学术语言来表达，就是“地方消费主义”)。而一个地方作为整体性消费品的质量(即：地方质量)，不但取决于舒适物的数量与水平，而且取决于舒适物与反舒适物的比例关系。人才的地方偏好构成了一个地方或城市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一个城市的质量，取决于地方“舒适物”的数量和水平，以及与“反舒适物”的比例关系

过去，消费单位往往被界定为个体或家庭，这种界定符合私人消费的情况，但许多消费过程是不能以个体或家庭为消费单位(或消费预算单位)的。例如，自来水、管道煤气、电力、电视、广播、文艺演出、医院、学校、公园、公共交通、环境质量、垃圾处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等等，只能以社区、城市，甚至以全国为消费单位。这一类超越个体或家庭消费单位的消费，就是“集体消费”。集体消费的存在，意味着更大范围的消费单位的存在，如：社区、城市与国家。伴随着消费单位的扩大，消费者的消费层级也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更高的消费层级意味着消费对象的范围扩大，即：从具体的物品消费上升到对一个地方或城市之整体的消费。这种对更高层次或更大范围的消费对象的价值偏好和相应的价格支付意愿，可以称为“地方消费主义”。

一个地方消费品质的高低，可以根据居住其中的居民是否总体上感到舒适来判定。而居民的舒适感，是有着明确的、具体的、可分析的来源的。既然这种来源明确的东西引起居民舒适的感觉，那么，这些东西就可以称为“舒适物”。在此意义上，地方消费品的主要内容，就是各种舒适物的组合，即舒适物系统。由此出发，地方消费品质的高低，可以分别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方面，舒适物种类的多寡及其等级的高低；另一方面，反舒适物与舒适物的比例。

什么是舒适物呢？简单地说，舒适物是各种使人感到舒适、愉悦、快乐、满意的事物。在早期，学者们主要把舒适物界定为气候、阳光、地貌等令人舒适的自然地理条件。但是随

如何应对剩男问题

□ 冯媛

高峰，2005年以后回归正常；90年代以后出现性别失衡的国家，如前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越南，都将在2020年左右回归正常。

女孩的“消失”，是生育中男孩偏好造成的后果；男孩偏好的根源则是“男优女劣”的现实。

近年来，为扭转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某一时期内出生男婴与女婴的数量之比)失常，不少地方提出了硬指标，表明此问题已经受到决策者前所未有的重视。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势已被遏制，大致于2008年-2009年在120(每100名女婴对应120名男婴)顶峰上出现拐点，自此有所下降。但细察形势，严峻依旧，且有多方面的忧患：2010年普查，13个省继续上升，其中有原本不太高且曾下降的省份超过120的有13个省，占全国当年出生总人口的60%。分孩次看，出生性别比从第一胎到第三胎都有攀升，而以第一胎性别比增幅巨大；分城乡看，城市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向加剧；分地区或民族看，一些地方的上升态势仍然强劲，向来自有问题的一些藏族地区，也出现跳高。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办公室2012年出版的报告，“90后”至今，全球有3900万“消失的女孩”，相当于20岁以下女性人口的7.6%。中印二国之和占全球的95%；其中，中国“消失的女孩”是2400万，印度为1300万。

如果以107这个公认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上限为基准，以1950年-2110年的时间跨度来进行全球考察，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在1985年-2055年间持续存在，可谓出现早、峰值高、蔓延广。只有个别国家在个别情况下超过我国。数据显示，印度2040年到2100年间仍将在108的高点；韩国1990年达到116.5的最

舒适物城市居住。因此，要分析人们的消费行为，我们不但要分析他们消费什么东西，而且要分析他们在哪里消费，因为“地方”也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以住房消费为例。人们不仅消费住房，而且消费住房所连带的各种舒适物资源。优质的居住环境给居民带来无形的“心理收入”。

地方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决定了知识精英或专业技术人才的舒适物导向的择地行为或移民倾向。一方面，他们的人力资本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使得他们有能力选择到高舒适物城市去就业。另一方面，知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对地方质量(舒适物系统)有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他们有更高的地方消费主义倾向。一旦某个地方的舒适物系统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或者反舒适物过多，他们就会离开这些地方。在此意义上，地方消费主义体现为知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对地方或城市实行“用脚投票”。在这里，地方或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性消费品，接受人才“用脚投票”的检验。

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的角度看，人的择地行动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是理性人或经济人，追求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体现在工作地的选择上，就是到物质回报最高的地方去工作。另一方面，人又是感性人，在选择工作地的时候，追求舒适和享受，即追求舒适物。于是，人就在经济机会和舒适物之间进行权衡。而最能体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统一的地方，往往是大型或中型城市，于是，拥有高人力资本(或教育)和生活的人才，往往喜欢到大中型城市去工作和生活。大中型城市不但拥有更多的消费舒适物，而且具有更大的宽容度和多元性(社会舒适物)，从而更为创意人才所青睐。

知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对“舒适物”的要求更高，城市必须接受他们的“用脚投票”

舒适物系统决定了一个地方或城市的宜居性、舒适性与享乐性。对于居民来说，居住地不但具有工具性功能(工作、创业)，而且具有自目的性功能(如生活性享乐与愉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对居住地的选择，越来越看重其自目的性功能(享乐)，而不仅仅是工具性功能(工作)。这一变化，揭示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从物品消费主义上升到地方消费主义。在过去，人们的消费享乐更多地来源于对一个具体的物品或服务消费，如：住房、汽车、餐饮、奢侈品、电影等。今天，人们的消费享乐的来源除了这些具体的物品或服务，还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对象，即一个承载了舒适物系统(包括自然舒适物、人造舒适物、社会-文化舒适物等)的整体性的地方。随着人们越来越把地方或城市之整体当作消费对象(即：扩大的消费品)，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在高

人才追逐“舒适物”，高新技术产业又追逐人才，从而倒逼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舒适物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随着交通设施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产业越来越倾向于定位于拥有更多舒适物的地方，而不是靠近自然资源(煤矿、铁矿等)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提升了。

既然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产业的投资选址就越来越趋向于靠近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充足的地方。于是，资本或公司的选址，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选址。人才的择地偏好或地方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选址偏好。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就越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就越需要跟随技术人才的择地偏好进行公司的选址。

既然高新技术人才对舒适物系统等级往往具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他们的地方消费主义更为显著，那么，公司，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选址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投资地的舒适物的最大化，因为舒适物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公司追逐舒适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追逐人才。在过去，是人才追逐工作，哪里有工作，人才就去哪里；今天，是工作追逐人才，哪里有人才，公司就到哪里落户，并提供工作机会。这不但在西方是如此，而且如今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追逐舒适物而聚集到舒适物系统等级较高(高舒适物)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房租和房价的上涨以及生活成本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难于支付高工资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因为各种生产成本的提升而迁出城市。而那些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能够支付相对较高工资水平的公司或产业，才能在高舒适物城市生存下去。这一过程导致高舒适物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排挤了投资回报率低的产业。由于创意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属于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因此，它在高舒适物城市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

如果高舒适物城市不能有效排挤那些低端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产业，那么，往往会导致反舒适物(环境污染、空气质量恶化等)的增加。这种状况常常驱使高素质人才的迁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迁，或阻吓外地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移入，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衰落。而经济衰落导致本地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失业人口的增加，进而引发犯罪率的提高，后者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端人才和高技术公司的出走。

可见，舒适物和反舒适物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舒适物从正面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舒适物则不但影响城市产业的升级，而且驱使已经进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迁出，或阻吓外地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

很显然，一个地方或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仅仅遵循经济的逻辑，而且也遵循社会-文化的逻辑。地方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劳动者，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形成对特定类型舒适物的偏好以及相应的移居行为。而高端人力资本密集型公司则不得不追逐高端人才的去向，哪里高端人力资源丰富，就哪里落户。而那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有偏好的地方政府，则不得不考虑高端人才对舒适物的偏好，并不得把保护和建设城市舒适物当作一个具有经济产出的事业来做。经济、文化与权力于是在城市舒适物这个问题上，将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这种一致，构成可持续发展与消费的内在机制。其中，消费文化的演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

铁矿等)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要素中的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提升了。

既然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产业的投资选址就越来越趋向于靠近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充足的地方。于是，资本或公司的选址，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选址。人才的择地偏好或地方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选址偏好。越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就越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就越需要跟随技术人才的择地偏好进行公司的选址。

既然高新技术人才对舒适物系统等级往往具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他们的地方消费主义更为显著，那么，公司，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选址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投资环境是否有利于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投资地的舒适物的最大化，因为舒适物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公司追逐舒适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追逐人才。在过去，是人才追逐工作，哪里有工作，人才就去哪里；今天，是工作追逐人才，哪里有人才，公司就到哪里落户，并提供工作机会。这不但在西方是如此，而且如今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追逐舒适物而聚集到舒适物系统等级较高(高舒适物)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房租和房价的上涨以及生活成本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难于支付高工资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因为各种生产成本的提升而迁出城市。而那些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从而能够支付相对较高工资水平的公司或产业，才能在高舒适物城市生存下去。这一过程导致高舒适物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排挤了投资回报率低的产业。由于创意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属于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因此，它在高舒适物城市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

如果高舒适物城市不能有效排挤那些低端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产业，那么，往往会导致反舒适物(环境污染、空气质量恶化等)的增加。这种状况常常驱使高素质人才的迁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迁，或阻吓外地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移入，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衰落。而经济衰落导致本地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失业人口的增加，进而引发犯罪率的提高，后者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端人才和高技术公司的出走。

可见，舒适物和反舒适物分别从正、反两个角度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舒适物从正面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舒适物则不但影响城市产业的升级，而且驱使已经进驻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迁出，或阻吓外地高新技术产业的进入。

很显然，一个地方或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不仅仅遵循经济的逻辑，而且也遵循社会-文化的逻辑。地方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劳动者，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形成对特定类型舒适物的偏好以及相应的移居行为。而高端人力资本密集型公司则不得不追逐高端人才的去向，哪里高端人力资源丰富，就哪里落户。而那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有偏好的地方政府，则不得不考虑高端人才对舒适物的偏好，并不得把保护和建设城市舒适物当作一个具有经济产出的事业来做。经济、文化与权力于是在城市舒适物这个问题上，将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这种一致，构成可持续发展与消费的内在机制。其中，消费文化的演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



让金牌回归竞技本身

□ 邓线平

单单取消行政赋予体育金牌的各种价值是不够的，行政还需从干预体育的过程中脱离出来。

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通报中提出了对赛事管理审批、运动员选拔等方面的整改思路与措施，同时提出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并将以严厉措施杜绝运动员选择“寻租”等违法行为。

体育金牌被集体荣誉光环遮盖，被行政主导，被经济侵袭，使金牌丧失了它本应有的竞技内涵。这是使金牌回归竞技本身的一大举措，但与此同时，要凸显金牌对于竞技的价值，否则，金牌价值会掩盖在另一种行政主义之下，即金牌与一般的牌和一般的工作没有区别。

竞技是人类自我超越的一种本能和需要。当人类面临自然挑战时，需要自我超越，竞争是看谁更能应对自然挑战。中国古代，就有骑马、射箭、武术、投掷等诸多竞技项目，骑马、射箭、投掷依然存在现代奥运项目中。西方也是如此，古罗马斗兽场，展现的是人类超越自我与兽类搏斗的场景。

竞技说到底是一种技能的比拼，集中于比拼的项目上，体现人体的极限。真正的竞技给人类带来的震撼和超越之感。我做不到的，有人能做到，别人能做到，我也要尽力做到。现代奥运体现的更快、更强、更团结，背后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在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上，竞技才充分体现其本身，金牌是对优胜者的奖励。

现代社会，竞技已深度体制化了，包括行政力量的参与，公司广告、转播力量的参与。在我国，集中表现为行政力量的参与，市场力量越来越卷入其中。在西方集中表现为市场力量的参与。一到竞赛，就可看到各类人员参杂其中，有组织者，有裁判，有现代体育设备，有广告人员，有记者，有观众，有转播车；运动员反而只是少数部分。

体制化本身没有错，毕竟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处于体制中，体制本身并不将竞技排除于人类需要的范畴。运动员也离不开体制，离不开人群。关键是体制不能将竞技异化，使金牌竞争脱离竞技本身。

体制对金牌竞技的异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包裹竞技，使竞技丧失竞争功能，体制内可以瓜分金牌；还有一种是体制参与竞技，使竞技的纯粹性丧失，竞技不再是人体极限的挑战，而是体制参与技术与金钱的挑战。竞技者双方背后都有体制力量，有体育官员，有组委会，有裁判，有后勤保障人员，有教练员，有赞助商，有转播者。只要任何一种力量超出了竞技本身，竞技的公平性与纯洁性就会受到污染。

现在社会，完全公平的竞争和纯粹人体极限的挑战是没有的，里面有太多的金钱、技术、规则制定参与其中。但并不因此，竞争所导向的公平、超越就会消失。在体制深度参与竞技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要做的是如何保证竞技的公平公正。

对中国来说，现代竞技是西方社会产物，由于国家落后，竞技从一开始就带有整体超越的痕迹，赋予它强烈的民族荣誉感。过去是集中于外部超越，集中力量办大事，竞技本身还是存在的。随着内部竞技兴起，竞技越来越脱离竞技本身，它被体制的包裹，一方面，体制分配金牌归属，另一方面，体制的不完善给各级体育组织、公司不规范参与竞技提供了机会。

对内部竞技的异化与过于追求对外的竞技荣誉分不开，过于追求外部荣誉，对内表现为行政组织体育。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使得有关竞技的各方面被扭曲，规则制定、裁判安排、运动员训练、后勤保障等。加之，现代体育的金钱驱使，使得内部规则越来越混乱。贿赂裁判、规则倾斜、兴奋剂、小动作等各种干扰不断，金牌竞争脱离了竞技本身。

这次体育总局的整改措施主要针对以前行政主导所导致的金牌战略所带来的问题，但单单取消行政赋予体育金牌的各种价值是不够的，行政还需从干预体育的过程中脱离出来。如果没有后者，体育金牌只是沦为行政价值重新安排下的一个环节，它本身的价值依然被行政所掩盖，或者沦为新的行政附庸，或者与一般的工作无异。

金牌回归竞技本身，不是不要金牌，也不是不要金牌荣誉，而是要澄清金牌荣誉。对政府来说，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无论是全运会，还是奥运会，让大家公平竞争。只有回到竞技本身，金牌竞争才能给人带来愉悦和超越感。回到竞技本身，人们更愿意回馈金牌获得者，反过来，竞争者更有获得金牌的竞技动力。

当前急需去行政主导和规范竞争平台。一方面，资源更集中，也更节省，不再进行行政浪费——名为投入体育资源较多，实际用于运动员训练和比赛的经费少。去行政化还意味着将体育回归社会。另一方面，要规范企业、转播对体育的介入，避免金钱对竞技的不规范参与，从而使竞技越来越回归内部专业比拼，而不是依靠兴奋剂或其它一些手段来提高水平。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